



纪念中国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丛书

大试验

中国经济特区创办始末

A Great Experiment: 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 钟 坚 著

商務印書館

中国经济特区史话

纪念中国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丛书

大试验
——中国经济特区创办始末

钟坚 著

商務印書館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试验：中国经济特区创办始末/钟坚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
(纪念中国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丛书)
ISBN 978 - 7 - 100 - 07221 - 2

I. 大… II. 钟… III. 经济特区—经济史—中
国 IV. F127.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8067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大试验
——中国经济特区创办始末
钟坚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7221 - 2

2010年9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9 1/4
定价：54.00元

“纪念中国经济特区成立 30 周年丛书”编委会

主任：章必功

副主任：陶一桃 李凤亮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刘志山 李凤亮 吴予敏 吴俊忠 苏东斌 陈家喜

姜 安 相南翔 郝 睿 钟 坚 钟若愚 袁易明

章必功 陶一桃 黄卫平 鲁志国 魏达志

主编：李凤亮

副主编：苏东斌 姜 安

组织策划：王 瑜

总序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2010年是中国经济特区创办30周年。相隔有岁，但特区之建立与改革开放之推行有如孪生弟兄，相继着力，共推中国走向现代文明。若言中国新一轮现代化自改革开放始，其坚实之第一步，则从建立经济特区起。1980年，党中央、国务院以非凡勇气建立经济特区，30年过去，如今各级各类经济开发区已遍地开花，与当年的先行者——经济特区一道，映射中国经济发展之跫然足音。其中，尤以深圳经济特区最具代表性。特区的价值难以尽数，最重要莫过于其试验性。“摸着石头过河”，社会之变革无法在电脑上模拟，任何不慎都可能导致不菲的代价。特区之试验性，上至决策者的政令，下至创业者们义无反顾地“南下”，热血满腔，而前途难知。所幸家国有幸，大事得成。今日，经济特区的建设已是成绩斐然，堪称伟业。凡此种种，无须赘言。

先贤语：“三十而立。”30年中，特区在争议声里昂然前行，以速度迅捷与财富累积彰显优势。30年之后，昔日之茁壮少年已成长为成熟稳重的青年，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注重社会综合协调发展成为摆在特区建设者面前新的课题。年岁的增加给了我们盘点的机会，角色的转换更需我们多加理性审视。回顾30年来之成就与缺陷，斟酌当下纠结之矛盾与困境，对于特区而言，此种反思与审视，大有裨益。30年历程，固非一帆风顺，个中甘苦，非回顾，无以显其曲折与别致，面对当今，则无从知晓成就与困顿之所由来。“疏通知远，书教也”，贯通30年历史，恰可观其中之丰贍与缺漏，正可作今天与明日之风帆。而此举，于深圳大学，更是当仁不让之责任。

深圳大学作为深圳经济特区目前唯一一所综合性大学，本身即改革开放之产物。建校虽略晚于特区，但深圳大学自创立始，即秉承“脚踏实地、自强不息”之精神，

与特区之发展同声气，为特区之进步尽心力。大学诸君虽身处“滚滚天下财富，岁岁人心浮动”之境地，但能力戒浮躁、潜心向学，自觉加强学养、恪守学范，以做真学问为研究之精义，以追求独立思想为著述之信仰，以回馈社会、造福人民为修学之旨归。历时二十七载，孜孜不倦，本套丛书即为研究成果之一束。

丛书以“纪念中国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为统摄，既宏观中国，又微观深圳，以特区经济研究为主，兼及政治、文学、文化、传媒等社会发展诸方面的论述。各位著者均为学林翘楚，术有专攻，又多在深圳特区工作、生活有年，耳闻目睹鹏城扶摇之历程，切身感知特区变革之硕果，可谓学界中有实力亦最恰当之发言者。丛书之编纂，既为展示深圳大学特区研究这一特色学科之部分成果，更乃致贺深圳特区而立嘉年之薄仪寸礼。丛书本欲涵盖特区教育、法律、艺术等诸方面，但因另有他述，或限于条件，未能周全，亦存憾意。

雄关漫道，迈步从头。特区发展30年为一节，30年之后亦为一始。年初汪洋书记曾三问深圳：而立之年，立起了什么？迎接30年，深圳要做什么？未来30年，深圳要干什么？诚然，30年之中，成绩彪炳，但年岁日增，积年必有陈陋。如何总结过往，破旧立新，谋大格局，成大事业，领航未来，任重道远。

期冀本套丛书能引起关注、批评，并为特区之继续发展略尽薄力。

是为序。

章必功

2010年5月

目录

第一章 改革开放的关键抉择 1

- 第一节 历史出现新的重大转机 1
- 第二节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10
- 第三节 派出多路考察团出访取经 15
- 第四节 召开国务院务虚会 35
- 第五节 邓小平发表“北方讲话” 39
- 第六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历史新纪元 44

第二章 经济特区的酝酿与决策 51

- 第一节 试办出口商品基地 51
- 第二节 中央批准创办蛇口工业区 68
- 第三节 广东、福建要求先走一步 83
- 第四节 邓小平倡导创办特区 95
- 第五节 谷牧奉命筹办出口特区 102
- 第六节 从出口特区到经济特区 119

第三章 经济特区的筹备与创办 147

- 第一节 经济特区的选址与范围 147
- 第二节 制定《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165
- 第三节 “蛇口模式”及其影响 172
- 第四节 经济特区规划与起步建设 183
- 第五节 江泽民率团考察国外特区 191
- 第六节 经济特区在非议中前行 197
- 第七节 邓小平第一次视察经济特区 265

第四章 经济特区的转型与发展 287

- 第一节 经济特区范围的扩大 287
- 第二节 建立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 296
- 第三节 发行特区货币决策始末 304
- 第四节 向外向型经济爬坡与转型 315

第五章 创办海南大经济特区 327

- 第一节 海南岛可比照特区做法 327
- 第二节 海南“倒卖汽车事件” 341
- 第三节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44
- 第四节 “洋浦模式”与“洋浦风波” 355
- 第五节 对海南特区发展的几点认识 369

第六章 经济特区从一种模式到多种模式 371

- 第一节 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 371
- 第二节 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 386
- 第三节 开发开放天津滨海新区 396
- 第四节 经济特区向多形式发展 409
- 第五节 经济特区肩负历史新使命 415

第七章 经济特区创办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426

- 第一节 经济特区发展的世界性问题 426
- 第二节 经济特区的发展模式问题 430
- 第三节 经济特区发展的性质问题 435
- 第四节 经济特区与市场经济关系问题 445
- 第五节 经济特区政策与WTO关系问题 446
- 第六节 经济特区的发展前景问题 448

参考文献 450**后记 455**

第一章

改革开放的关键抉择

我国经济特区的创办，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倡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顺应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新趋势，在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推进改革开放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第一节 历史出现新的重大转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方针的历史性重大决策。中国经济特区的创办与建设，正是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大背景下，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和试验区而展开的。

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

中国经济特区的创办与崛起，是与当时我国所处的有利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客观上我国没有具备全面实现对外开放的环境和条件。到了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逐渐出现了重大的阶段性转变，世界性战争与革命周期已基本结束，国际形势的发展由对抗转入对话、由紧张趋于缓和，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而且有可能避免，争取和平、谋求发展成了时代的特征，和平与发展构成了当今世界的主题，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世

界和平与发展的新形势，两种制度共存竞争的新格局，既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再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又为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起飞和现代化创造了新的发展契机。一是美苏之间的争霸，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由于侵越战争失败、阿富汗战争陷入困境逐渐转为僵持的局面，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大大减少。二是电子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标志着世界进入了高科技时代，世界各国的经济、信息联系和相互依赖性加强，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求得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三是西欧、日本得益于科技和管理体制创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为发达国家的代表。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经济获得持续高速增长，大步跨入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行列，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典范。四是东欧国家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60 年代中期和 70 年代末期，先后掀起三次改革浪潮，尤其是匈牙利经济模式及其成果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世界新科技革命，也称作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兴起于二战以后的美国。这次科技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二战期间积累的本来服从于战争需要的军事技术转移到民用上来，使得原子能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尖端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并广泛应用。在原子能技术方面，1945 年，美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标志着利用原子能时代的开始。1957 年，美国西屋公司建成世界上第一个压水堆型商用核电站，苏联以及英法等国也相继建成了核电站。在信息技术方面，1946 年，世界上第一台电脑 ENIAC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1958 年，晶体管计算机出现。60 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每秒运算千万次的集成电路，即第三代计算机。1971 年世界上第一台以大规模集成电路做芯片的微型计算机在美国制成。与此同时，微型计算机和微处理机，家庭和个人用电脑迅速发展。在生物技术方面，1972 年，美国科学家成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 DNA 重组实验；1978 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在英国出生。在空间技术方面，1957 年，苏联相继成功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1969 年，美国“阿波罗 11 号”飞船首次登月，1981 年，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又成功发射。此外，新材料技术、海洋技术等也迅速发展。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使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日本、欧洲经济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 1973 年石油危机爆发，这个时期也被称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20 世纪 80 年代，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度过了两次大战后的经济恢复和重建阶

段。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把新技术、新工艺广泛地用于生产，开发了大量新产品并形成大量新产业，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与此同时，它们又利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把大量商品打入国际市场，把大批剩余资本投放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了由于生产相对过剩而带来的滞涨和危机相间发生的情况，大量资本和技术找不到投放的场所。不少准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在商品和资本两类输出上出现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市场的态势。此外，这些国家和地区又正处于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转移的过程，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在世界其他地区寻找新的出路。这一方面可为我们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吸收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国际条件；另一方面对商品、资本、技术的输出国来说，自然也提供了新的、最广阔的市场。在这期间，中国周边原来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香港地区与台湾地区、新加坡、韩国等，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地资本和技术，利用本地的劳动力优势，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起飞。弹丸之地的香港，经过 20 年快速发展，其经济发展竟居亚洲“四小龙”之首，拥有众多的世界之“最”。1977 年进出口总额达到 196 亿美元，而整个中国内地当年只有 148 亿美元。^[1]20 世纪 50 年代，韩国的经济总量和中国的山东省差不多。但在随后的 20 年里韩国创造了著名的“汉江奇迹”。中国共产党正是抓住有利条件和发展机遇，不失时机地作出了改革开放和创办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对外关系得到极大改善。从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敌视中国，经济上歧视封锁中国。这个时期，我国主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只能是个别的、小额的。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停止了对我国的一切经济技术援助，中国只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建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 年浩劫，由于“左”的路线和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经济建设孤立于世界各国之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及时地调整了外交方针，实行全方位外交。中国领导人纷纷走出国门与世界接触。我国同日本、美国和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从而排除了经济技术合作上的政治障碍。我国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也得到改善，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到

[1] 《港澳经济考察报告》1978 年 5 月 31 日。

1978年底，中国已与世界上116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就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正如1978年邓小平所说：“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1]

落后让我们反思什么叫社会主义

中国要发展，除了必须有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之外，还必须有一个好的、宽松的国内环境。20世纪50年代末和70年代末，我国其实不乏发展的周边环境和国际机遇。但是我们没有抓住和利用，错失了20年历史发展机遇。当时正逢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家，其中包括不少华裔巨富，纷纷将资金转入较为自由、稳定的香港避风。一时间，香港几乎成了“金港”，有大量游资急于寻找放贷和投资的出路，甚至到了存款者倒贴给银行利息的地步，使香港银行家不得不将沉积的资金以极低的利息贷出。目睹香港这种情况，我港澳工委负责同志即向广东省委汇报。1954年11月，广东省委将情况向正在广州视察的毛主席汇报，建议利用香港银行低息贷款，发展我国南方的工农业生产。毛主席指示：想法不错，写个报告，我把这个意见带回北京去商量。令人遗憾的是，报告呈上后，一直没有下文。原因其实很简单，当时我国的工作重点不在经济建设，而在阶级斗争。1957年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接着是人民公社、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然后是“反右倾”，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接着又是“四清”运动，然后是“文化大革命”，“揪党内走资派”，“割资本主义尾巴”，“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路下来，已是20多年过去了。20年意味着什么？在我们停滞和倒退之际，周边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正是在这20年中，利用机会加快发展本国和本地区的经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进行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时期，先后设立了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等形式的经济特区，以此作为引进外资、发展进出口、增加就业的基地，带动经济的全面增长。特别是中国台湾地区和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7页。

韩国创办出口加工区的做法曾引起周恩来总理的极大关注。1972年4月，周恩来在接见广交会代表时，询问了台湾产品对外加工出口获得巨大利润的情况，感慨地说：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我们这样伟大的人民，出口才比台湾多10亿，不值得骄傲。1973年6月29日，周恩来在接见美国银行家洛克菲勒时说：我们过去不会运用银行。我很直率地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他对做生意、搞贸易有那么一套。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原来我很奇怪，它的贸易额为什么这么高？一调查，清楚了。它吸收一部分外资，这部分外资当然是支持它的。而且你知道，台湾的劳动力很便宜，比香港和日本的还便宜。^[1]10月31日至11月3日，周恩来和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会谈时，又重提说：蒋介石在台湾省有一个高雄港是自由港，没有税，吸引外资带着原料去建厂，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劳务费，然后把商品回销外国。这样吸引很多外资到台湾去投资。^[2]遗憾的是，当时中国大陆正处于“文革”时期，极“左”路线占据统治地位，根本不可能设立经济特区。特别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长达10年的社会严重动荡，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利用外资时断时续，几经沧桑。我们曾是世界上唯一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而且也以此为荣。但封闭使中国和世界的差距却越拉越大。1952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例为5.2%，而到1978年下降为5%。1948年，中国人均GDP排在世界第40位，而到1978年则排在世界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三分之二。根据世界权威的经济增长学家麦迪森研究计算，1952年到1978年中国GDP的实际平均增长只有4.7%，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和生活水平，大多数发展和生活指标排在世界国家和地区170位以外，处于联合国有关部门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划定的贫困线之下。这是封闭造成的代价。而我们看看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却是另外一个景象。196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大体和日本相等，到1980年，只有日本的25%，日本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与中国大陆同一文化圈的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韩国，却同样以震惊世界的速度发展了起来，成为亚洲“四小龙”。邓小平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

[1] 《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5—646页。

[2] 《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30页。

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1]“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太快不切合实际，要尽可能快一点，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2]“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3]

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随后而展开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恢复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了条件，能够正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由此产生了极大的紧迫感。严峻的现实使邓小平等中央高层开始对“文革”这样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这样的“优越性”打出了沉重的问号。1977年1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和夫人时指出：“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我们的潜力很大，加上认真学习外国经验，在学习外国东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4]1978年3月10日，邓小平在出席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是要去实现它的优越性嘛。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5]这一连串问号，实际上是发出了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问号。其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成为全党全国的共识，大家都在寻找一条尽快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正像叶剑英当年所说：“现在，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国际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为了防止侵略战争，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这有利于我们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从国内来讲，我们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万众一心，迫切希望早日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的事业将能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证。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充分地利用这种国际和国内的有利形势，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地搞上去。”^[6]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0页。

[2] 同上，第64—65页。

[3] 同上，第202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

[5] 同上，第277页。

[6] 《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3—494页。

创办经济特区的理论渊源

创办经济特区，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而言尽管是一件新生事物，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仍然可以找到其理论依据。长期以来，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再加上极“左”思想的干扰，在对资本主义及其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上存在着一些误区，使我们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拒绝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关起门来搞建设，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错过了一些极好的机遇。其实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的有益成果，既是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面临的一个历史课题，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

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曾论述了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与吸收先进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相互关系。马克思在讨论落后的俄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时，把资本主义比喻为一个使人类得到巨大发展但又使人类遭受巨大灾难的“卡夫丁峡谷”，并进而提出了落后的俄国跨越资本主义这一“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但是，马克思严肃地指出，俄国要想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就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他说：“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么，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灭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1]马克思始终认为，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来，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下得到发展。马克思指出：“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2]“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和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3]可见，马克思显然把“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作为东方落后国家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前提。列宁认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4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页。

[3] 同上，第276页。

充分吸取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和文化遗产。他认为，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各种联系，“在经济上极力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的西方”^[1]。列宁甚至给社会主义下了一个简短的定义：“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 + 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 + 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 + 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 ++= 总和 = 社会主义。”^[2]列宁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3]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也曾主张向外国学习。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4]“外国资产阶级的一些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习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5]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不但没有得到坚持、贯彻和运用，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把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都当作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拒之于门外，关起门来搞建设，贻误了许多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时机。

在新时期，我们党从世界政治经济的大格局出发，科学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创办了作为直接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和信息等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窗口——经济特区。

举办特区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

中国经济特区，是在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举办经济特区的经验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创办的。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周恩来总理就曾经关注过台湾所设立的出口加工区和自由港。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人们开始按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

[1]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01 页。

[2] 《列宁文稿》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94 页。

[3] 《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11 页。

[4]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40 页。

[5] 同上，第 742 页。

神，解放思想，冲破长期以来经济工作旧框框的束缚，放眼世界，研究国外经济发展的新情况。世界上许多国家（地区）设置经济特区的做法，引起了人们的兴趣。1978年11月5—15日，邓小平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个国家，他在新加坡特地考察了裕廊镇工业区（属于工贸型经济特区），详细地听取了裕廊镇管理局介绍了工业园区的建设情况。这也是邓小平对外国经济特区建设的唯一的一次难得的实地考察。1980年9月26日—11月7日，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邀请并资助下，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同志率领考察组9人访问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墨西哥、爱尔兰等6个国家，对9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边境工业区进行了考察。1984年，邓小平曾经说，厦门实现自由港政策“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1]。谷牧同志后来回忆说：“当时世界上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00多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自由港，有效地开展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这种经验启示人们思考：我国沿海某些地区，是否也可以借鉴这种做法，以加强国际经济交往，促进国内建设。”^[2]1980年4月14日，广东省委副书记吴南生向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报告设置经济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情况时也说：“我们所讲的特区，从某种形式和内容来说，有点类似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加工区’，就是划出一块地方，引进外资，投资设厂，兴办各种出口工业。”“我们的经济特区是在人民政府管理的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的一种形式。我们采取这种形式，既借鉴了国际上经济活动的特点和经验，包括一些国家和地区举办‘出口加工区’的经验，同时根据中央关于大胆引进外资的指示精神和三个特区的实际情况，我们又有自己的考虑和打算。”^[3]1980年8月21日，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江泽民同志受国务院委托，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作关于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中指出：“这种经济特区吸收了世界上出口加工区的有益经验和通用做法，又有我国自己的特点。”^[4]198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曾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特区是扩大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经济的比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2页。

[2] 《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21—322页。

[3] 吴南生：《关于我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问题》，载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经济特区的由来》，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6—97页。

[4] 刘向东主编：《对外开放起始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第499页。